

張其昀二三事

王成聖

(本文插圖刊第二、三頁及第一三四頁)

總統府資政、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不幸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廿六日逝世，享年八十五歲。我國古來尊崇有德行學問，而以言教、身教振風俗世的人為「大儒」。張先生除了具備此一條件外，還自有一種宏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感，終生為其「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使中華文化更具新生命」的志業而戮力奉獻。無論治學、興學、從政，足以啓迪後起之處很多，謹恭述二三事以供中外讀者參閱。

筆挾風雷震撼士林

張其昀，字曉峯，一九〇一年（清光緒廿七年）十一月七日（陰曆九月二十九日）生於浙江鄞縣的一個世代書香之家。

民國四年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受到地理教師蔡和鏗和歷史教師洪允祥的影響，養成他後來圖文並重的著述習慣。

民國八年夏天，鄞縣學生會為響應五四運動，推派他為代表，前往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他本着「救國不忘讀書」的旨趣，考取「

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分入文史地部。由於成績優異，得到名師柳詒徵的賞識，指導他多致力於方志學、圖譜學、史料學，多讀地理，多研習科學；勗勉他追跡名儒顧炎武的史學和顧祖禹的地理學。另外南高師的文史地部主任劉經庶，授課思維術和哲學史，主張哲學與史學應相互為表裡，人類文化史應以思想史為核心，這些都對張其昀的畢生治學基礎有很大影響。

民國十二年一月「南京高等師範」改制成立「國立東南大學」，六月，張其昀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應聘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初中、高中地理教科書，獲得閱讀「東方圖書館」藏書的便利，前後工作了四年，學識益為精進。

北伐成功，「東南大學」改制為「國立中央大學」，他應聘為地理學系教師，由講師起，循序升任教授，任教十年之久，著作有：「中國民族志」、「中國經濟地理」、「浙江省史地紀要」，譯述有「戰後新世界」、「人生地理學」等書，同時為了以實地情況印證學理，曾有三次較長時間的旅行考察。第一次民國十八年秋，遊覽浙江全省；第二次民國二十年暑假，去東三省旅行

，東至安東鳳凰城，北至長春、吉林。第三次民國廿四年秋開始，以一年的時間，去西北各省作較廣泛而深入的旅行考察，以蘭州為中心，西循河西走廊到敦煌，北上蒙古高原到綏遠的百靈廟，南越秦嶺山脈到漢中。並且還到過青海大湖邊。他以沿途考察見聞，特別有助於史學研究之處，撰了一篇筆挾風雷的論文在「地理學報」上發表，情文並茂，震撼士林，風行一時，他說：

「巨石當前，見者多漠然而置之，然使此石為大人物之豐碑，則令人低回流連，不忍去焉。一國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之關係，殆如巨石之與紀念碑。所謂尺寸土地不能讓人者，豈僅以山川天然之美麗，地下豐厚之寶藏，尤其為我祖宗手足之所胼胝，心血之所灌注也。中國任何地方均含有整個民族艱難奮鬥之歷史，名勝古蹟，處處皆是民族之紀念碑，國民過此，豈有不動可歌可泣之情緒也哉。」

民國廿四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屆評議會，由全國各國立大學選舉評議員；他才卅五歲，也沒有留學外國，但却以優異的學識表現獲得當選。

應邀訪美研究講學

民國廿五年夏，國立浙江大學創設地理學系，禮聘他為主任教授，於是他離開中大回到家鄉，以發揚浙東史學傳統為己任。

抗戰軍興後，浙大一再播遷，並且遭受敵機大轟炸，最後才在貴州的遵義安頓下來。此時，浙大已成立「史地研究所」，他兼任主任，分設：史學組、地形學組、氣象學組、人文地理學組，當以從事邊疆實地考察為中心工作，大凡地質、地形、氣候、土壤、人口、土地利用、產業、交通、民族、史蹟等，均作詳盡調查研究，而特別注重民生利病，比如土地利用一項，乃以民國廿九年「陸地測量局」出版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為底稿，填入實際調查的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等資料，並且加以解釋，提出建議，這種「土地利用圖」的做法，在我國尚屬首創。

民國卅年八月，他與當時任浙大文學院長的梅光迪和任史地學系教授的張蔭麟等合作創刊「思想與時代」月刊，溝通中西文化，研討建國問題。他曾撰作發表：「國防中心論」、「中國之陸權與海權」、「再論建都」等文。致力於地略學（即政治地理學）的專精深入之研究。

民國卅二年二月，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函請中國各國立大學校長遴選教授一人赴美作訪問研究；各校選出應聘前往的，為「浙大」的張其駒、「西南聯大」的金岳霖、「四川大學」的蕭作梁，和「雲南大學」的費孝通等六人。九月，張其駒開始在「哈佛大學」從事兩年的研究，大

部份時間致力於地略學，並且作多次旅行訪問。十一月十二日為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他在美國西海岸，利用美國遠程無線電網，以「戰時之美國青年」為題，對我國內發表廣播演說，以美國青年戰時從各方面報效國家，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情形，激勸我國青年團結合作，為爭取最後勝利努力。

民國卅三年三月廿九日，經美國國務院介紹，赴 Maryland 參觀海軍軍官學校，在該校為紀念主張海權論的名戰略家馬漢的圖書館「馬漢堂」前，徘徊懷念，不忍離去。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應邀前往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拜訪校長 Dr. Isiah Bowman 談到中國戰後建國問題，他表示中國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純大陸國家，而在航海事業上早有素養。將來應光大此一素養，奠立海外和平的基礎。當二人討論到世界安全組織時，他也明白表示：民主和平的方法美意，在中國的哲學上，歷史上早已有此理念。

抗戰勝利，他結束在美國兩年的研究訪問，回到已經復員的國立浙江大學，仍然擔任史學系和「史地研究所」主任。不久，接替梅光迪為文學院院長。當即整理八年播遷中搜集的資料，將史地研究所在遵義實際調查的資料，編成「遵義新志」一書，內容大都為地理學著作，特別重視地圖，與過去方志的體例不同。可說是一項創舉。民國卅七年秋，浙江大學新建紀念黃宗羲的「樂洲館」落成，專供文學院教學研究之用，收藏珍貴的文史書籍很多，於是他特地邀約研究所同仁和校外地理學專家廿餘人，編纂「中華民國地

理志」與「中華民國地圖集」，他自任主編，這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大計劃。可惜因為大陸情勢的轉變，只完成「地理志」的「通論」的第一冊「中國之自然環境」。

出任要職不廢著述

當他任浙大之時，以聲望之隆，見重於黨國，當選為第二、三屆國民參政員，與議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聲風範，見知於先總統蔣公中正，任命他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二屆中央幹事及常務幹事，此為他從政之始。

民國卅六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教育團體代表。行憲後，任考試院考試委員。

來臺以後，他於民國卅八年六月奉召追隨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公中正工作，奉派為「總裁辦公室」秘書組長，七月，蔣總裁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的邀請，前往碧瑤，商討如何發動組織「遠東國家聯盟」，以防止赤禍的漫延；並且積極增進遠東各國人民經濟與文化的水準，以奠定遠東永久和平的基礎，八月，再應韓國總統李承晚的邀請，前往鎮海軍港，商談遠東聯盟計劃，他都是隨員之一。事後，他曾以「碧瑤記行」與「鎮海記行」記述此事：

「遠東的範圍，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碧瑤會議暫取狹義，以中、韓、菲三國為基本會員，再徵求南洋諸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印尼）的同意。鎮海會議的性質與碧瑤會議相同，只討論基本原則，未談具體的實施辦法。」

此事因為客觀環境不成熟，後來無形中擱淺。

他還有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撰述「中國國民黨簡史」，在准許閱覽並引用蔣總裁個人日記和文件的便利下，他廣搜資料，詳加考證，花了兩年時間，于民國四十四年四月，編成「黨史概要」上册，(內容自與中會起到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公開發行，由於資料多事情也多，乃將上册改為第一册；到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已出刊到第五册，為便利一般民衆閱讀，此書改名為「中華民國史綱」，並且列入「國民基本知識叢書」之中。

民國卅九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撤銷，他改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出版「中國一周」等書刊。八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選委員會成立，他以改造委員兼任秘書長。雖然公務繁忙，但他却利用星期假日，從事著述。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他再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成立後他仍兼任秘書長。

書生從政空前建樹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俞鴻鈞出任行政院院長，延攬張其昀為政務委員兼教育部長。當時教育方面的問題很多，可謂百廢待舉。他在職四年，不但排除艱難，頗多創設，而且能够籌策定法，影響深遠。創辦學校方面，首先着手大陸原有太學的恢復，雖說「國立政治大學」的復校預算，並未能在當年(民國四十三年)編列追加；但他却毅然在艱苦的情況下，先行在木柵籌設「政大

研究部」委託「揚子公司」建造木造活動房屋，於四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開學，次年再辦大學部，預算問題也已解決。

為增強高深學術的研究，於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安排「國立清華大學」在新竹復校，先成立「原子科學研究所」；民國四十六年，再恢復「國立交通大學」，先成立「電子研究所」。

「清華大學」能迅速的在臺灣復校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清華自己已有董事會，管理基金董事的成員，中外人士各半，動用基金利息，必須董事會通過。張其昀以為與其聽他們在美國支配使用，不如我們在國內恢復建校，可以收到比較宏大的效果。於是他不避艱難的主動與董事會研商，提出復校計劃，方得順利成功。

為加強培養中學師資，於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升格擴充為「師範大學」，並且首先在該校創立「國文研究所」與「英語研究所」，邀請梁實秋負責主持，當時梁以為條件尚不具備，人才難求，有點不大以為然，他却毅然表示：「要辦就辦，必俟條件俱備，恐一事皆辦不成」。梁實秋只好承擔下來，他這種說辦就辦的精神，實為此後各校紛紛成立研究所開了先河。為培育華僑學生，於民國四十四年在板橋浮洲里創辦國立「華僑中學」，另在臺北縣蘆州創辦「國立道南中學」。

為培養藝術人才，於民國四十五年在浮洲里創辦「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除了創辦學校，他還構想在臺北市鬧區創建一系列的社會教育機構。但臺北市區土地不易尋

覓，而且當時也無此巨額經費作購地之用。於是他查勘到植物園，乃即商同交通部撥讓眷舍地址，臺北市政府市議會撥用土地，於是，先後恢復擴建「國立中央圖書館」並創建「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館」、「國立臺灣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教育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紀念林獻堂的「獻堂館」。

以上各機構的建築，都採我國古來的宮殿式，紅牆綠瓦，古色古香，美侖美奐，配合植物園的花木葱翠扶疏，充份顯現中國文化形象，被人稱為「南海學園」，成為外人來臺北觀光必到的場所。

先是，民國四十三年之前，各大專院校均係分別自行招生，其中有些私立學校有向學生勸募建校經費之事，如學生認捐若干，就可順利錄取。另外也有請達官貴人書函情托，或用人情包圍等情事。因此，很難做到合理公平。何況，學生擔心考不取，同時報考幾所學校，也疲於奔命。因此，他特為創立大專院校聯招聯考辦法，自實施以來，錄取與否，全憑考生真才實學，絕無特殊僥倖。多年來雖然各方對此辦法尚有批評，尚以為不能盡如人意；但為了合理公平，還沒有比聯合招生更好的辦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文教組織規定：「會員國的適齡兒童入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五，即須延長義務教育為九年。」民國四十四年我國臺灣的適齡兒童入學率已高達百分之九十六。本應延長為九年義務教育。同時小學五、六年級小學生為了升入理想初中，往往參加惡補，戕害學童身

心。他乃指令部屬擬具免試升學方案，呈准行政院，先指定由新竹縣於民國四十五年先行試辦，結果試辦成功，於是再指定高雄縣試辦，如獲成功，即令各縣市普遍辦理。但因爲民國四十七年六月行政院改組，新任教育部長認爲免試升學如普遍實施，問題很多，所以明令停辦。可是，他的此一舉措，與現在實施的九年義務教育，雖說辦法上有不同的地方；（免試升學是實驗的、志願的、收費的；九年義務是普遍的、強迫的、免費的。）但精神上却是一貫的。

他在教育部長任內做了不少事，辦公總是早到晚退，中午就在辦公室進最簡單的午餐。食後小睡，他做到案無留牘，對外函牘，除正式公文必須按部中規定，循序作業外；其餘的概不假手他人，都是自己用毛筆小楷處理，寸楮小箋，總是清楚有致。

創辦文大日新又新

民國四十七年秋，行政院改組，他卸去教育部長職務，相繼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主任，在院長蔣公中正的親自指導下，調訓全國黨、政、軍、公教、社會高級幹部，施以「總體戰」教育。自民國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四年之中，在他的主修主編下，刊行了「元史」、「明史」、「清史」、「中華民國地圖集」、「文物精華」等鉅著。

當他卸任教育部長後，教育部原有的「文化研究委員會」即被裁撤。當時美國要創辦「東方文化研究所」，經費是一百九十萬美元。東方

文化產生在中國，日本係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此一研究機構應當在我國成立；但美國却在日本成立。他知道此事，曾以個人名義向美國交涉，爭取在臺灣設立此一機構，而不可得；所以他發出宏願，由他來以中國人的立場，自行創辦以宏揚中國文化爲主的教學研究機構，在陽明山尋覓基地，於民國四十九年呈准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民國五十一年正式成立。實踐他「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使中國文化更具新生命」的理想。他在華岡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完全赤手空拳；慘淡經營的結果，目前已改爲「中國文化大學」，有堂皇雄偉的校舍廿多座，日間部四十四系，夜間部十六系，學生一萬七千三百人，爲全國公私立院校之冠。

當學校校務蒸蒸日上時候，往往也是他困難重重的關頭，尤其是經費的供應問題，常常會有捉襟見肘之感，但他爲了建國理想，學術抱負，凡是應該興辦的科系、事業，他都不計損失，勉力以赴。爲了在國際間爭取有利形勢，觀光事業當然很重要，但無人創辦觀光系，他却獨力負起造就觀光人才的使命；無人創辦烹飪班，他却毅然接受造就烹飪人才的責任，他說出此事的重要：「一個辦理觀光業務的人，可以影響整個國際間的觀點。國外的一間餐廳，可以建立成一個國民外交的據點。在在與國勢消長有關，豈能爲了辦學經費一時的虧損，扼殺救國救民的迫切工作。」

他爲了辦學，發揚中華文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危坐在華岡的辦公室內，徘徊於校園之中

，舉凡立國根本，樹人事業，人文科技，道德宗教千秋萬世的道統，經天緯地的文章，都在他苦心焦思之中，志廣力絀，有時也難免遭受到困難疑謗，但他却從不灰心怨尤。

在華岡任教的潘重規教授描述他的見聞感慨說：「我在華岡幾年，也親眼看到全校教職員、榮民、學生、工友，沒有一個人不感覺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同事視如師友，同學視如父兄，任何人都可隨時親切的向他（張其昀）懇談，校務的繁多，人客的紛紜，還有參贊中樞的密勿，真够得上是日不暇給。但他事無巨細，都不忽視，而個人的著作，更是日新又新，舊作既已等身，新作又層出不窮。如中華五千年史、孔學今義等，都是傳世不朽的大著作；文化大學的教訓，標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啓迪後生。曉峯先生立德、立功、立言的身教，就是爲這四句教言，樹立好榜樣」。

爲了達成他「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使中國文化更具新生命」的理想，他於民國五十五年，再在華岡創辦「中華學術院」，內設各科「學術協會」廿個，羅致國內外學者專家二千八百餘人，曾召開「國際華學會議」兩次，國際漢學家紛紛前來參加。旋又創辦「華學月刊」，以溝通中外學者研究的信息與心得。於是，華岡遂成爲世界上研究中國文化的中心。民國六十九年，政府以他華岡興學已屆滿廿年，成績卓著，核准將「中國文化學院」改制升格爲「中國文化大學」。由於他對學術的卓越貢獻與教育的特殊

成就，聲聞中外；所以美國「西東大學」、「聖若望大學」，韓國「慶熙大學」都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民國七十二二年政府授予他最高榮譽的行政院文化獎章，總統府也聘他為資政。

著作等身儒家規範

由於他在教育部有「南海學園」等興作，又白手成家的開創「中國文化大學」，有些人譏嘲他「好大喜功」。但有識之士都稱許他這種衝動幹勁，認為這正是種難得的美德。

當民國五十四年春天。他約請「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全體委員到華岡參觀，立法委員喬一凡就致詞表示：

「有人說張其昀先生『好大喜功』，不過『好大喜功』四字須另加解釋；『好』是張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和現在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所辦教育事業，都是好的。『大』是張先生計劃的事業都是够大的。『喜』是張先生對教育事業的構想和措施，都是人們樂觀其成的。『功』是張先生的教育事業，對國家都是有功的。所以『好大喜功』四字恰如其份。梁實秋教授對此也有評論，他說：

「以我所知，曉峯先生確是好大喜功，不過我不認為這是他的短處，這正是他的長處。無論是在治學或治事，一個人若是有遠大的抱負，而且勤奮不懈，不避險阻，努力以赴，如果這就是好大喜功，我想當世這樣的人，實在嫌其太少了。積極做事的人才，是人才，積極做大事的人，即是領導的人才，好大

喜功是人才所共有的一個特點。」

他畢生從事研究創作，研究的範疇，都與國家民族有關，大概分爲五類：一是「國魂」，主要的是闡揚三民主義；二是「國史」，主要的是對中國文化淵源加以探討；三是「國土」，主要的是對中華民國的地略與政治地位的闡述。四是「國力」，主要的是揭明經濟建設與國計民生的關係。五是「國防」，主要的是對國防教育的貢獻。他著作等身，根據「華岡學會」編著的「張其昀博士著作年表」，計有專著二百種，論文：中文部份二千二百九十六篇，英文一百七件，犖犖巨著有「中國地理學研究」和「中華五千年史」等部。

梁實秋教授對他的「中華五千年史」和寫作文章有如下的評論：

「曉峯先生是歷史學家，他的『中華五千年史』真是皇皇巨著，現已印行七冊，其體制之宏偉，內容之豐富，論斷之持平，可謂從未曾有。這是他畢生功力之所粹。

曉峯先生的文章，有文言的洗鍊，有白話的流利，洋洋洒洒，自成一格，其氣勢之大，也是難能可貴的。」

他求才若渴，當他出任教育部長的第三天，就親自走訪名教授重規請其擔任剛恢復的「學術審議會」文學部門的委員。後來潘重規去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又去香港待養從大陸接出來的母親，改在香港「新亞書院」任教。他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後，每年都有聘函給潘，要求退休後回來臺灣，在華岡任教。使潘重規大為感

動，於民國六十四年回臺向他報到，任教華岡。張其昀因得蔣公特達之知，身任重寄，但却不脫書生本色，對人謙恭脫俗。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六日，出使黎巴嫩的繆培基奉召返國述職。他特地邀請繆培基往「國防研究院」講述以色列戰勝埃及與約旦聯軍後的中東態勢。當時，適逢蔣公蒞臨研究院辦公，他必須隨侍備詢，未能親自接待繆培基，也未能出席聽講。事後，他一再表示歉意。

他謙恭有禮，但不虛偽，不鄉愿，仍然有他嚴肅的一面。有一次他的老同學陳啓天在一項餐會中提出中大不應在中壠建校的意思，他不肯苟同，竟然不顧情面的當場予以駁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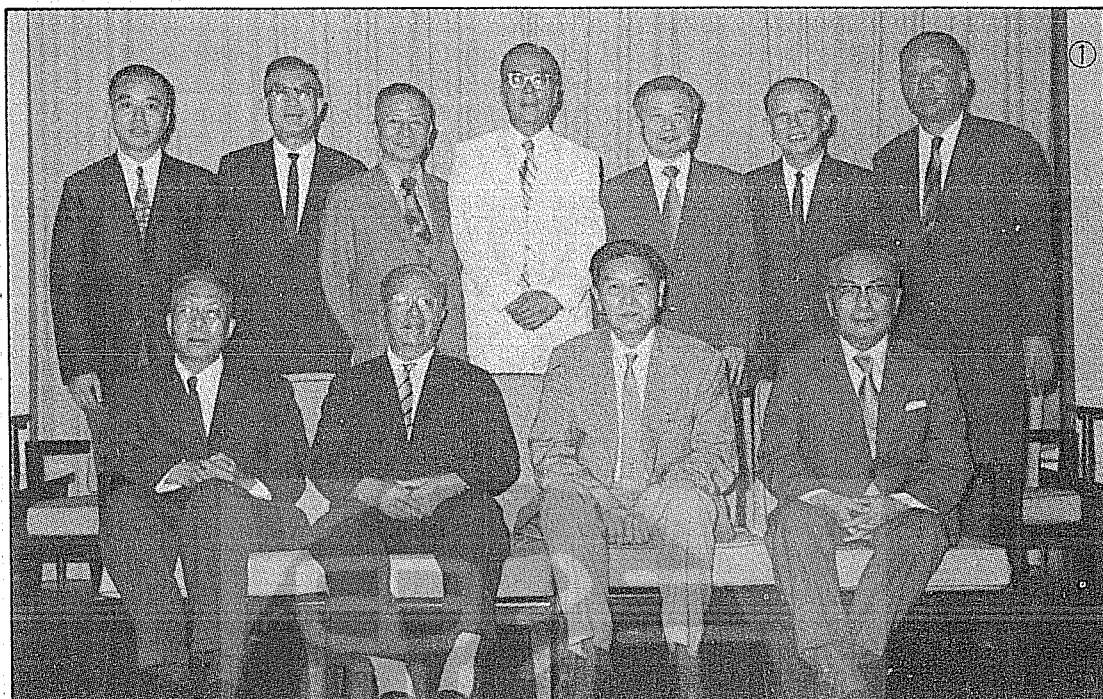
他節儉樸實，自然而不做作，他先後任職中央黨部秘書長、教育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仍然居住在臺北市龍泉街的一所簡陋狹小舊住宅中，夫人龔伯英終年勤勞家務。他臥病之前的平常生活，每餐僅有兩樣菜，一是紅燒臭豆腐，一是紅燒小魚一條，但每頓只吃半條。待客時，則另加紅燒白菜獅子頭；他只吃白菜，獅子頭則用以待客。他睡的是普通藤床，飲料是白開水，除處理公務、閱報、看書、寫文章外，一無嗜好，生活極爲平淡。他在中國文化大學不支任何薪津，私人的藏書二萬餘冊，全部捐贈「文化大學圖書館」，每次在學校出版的刊物中發表文章，向不支稿費，他自己私人的東西，由自己出錢，一切涓滴歸公。總之，他氣度恢宏，高風亮節，以熱情誠懇待人，以週到禮節接物；安於平淡生活，勤於治學處事；律已嚴肅，對友寬恕，實集我國儒家傳統於一身。



① 先總統蔣公與張其昀博士合影。

② 蔣公(前排中)與張其昀博士(前排左)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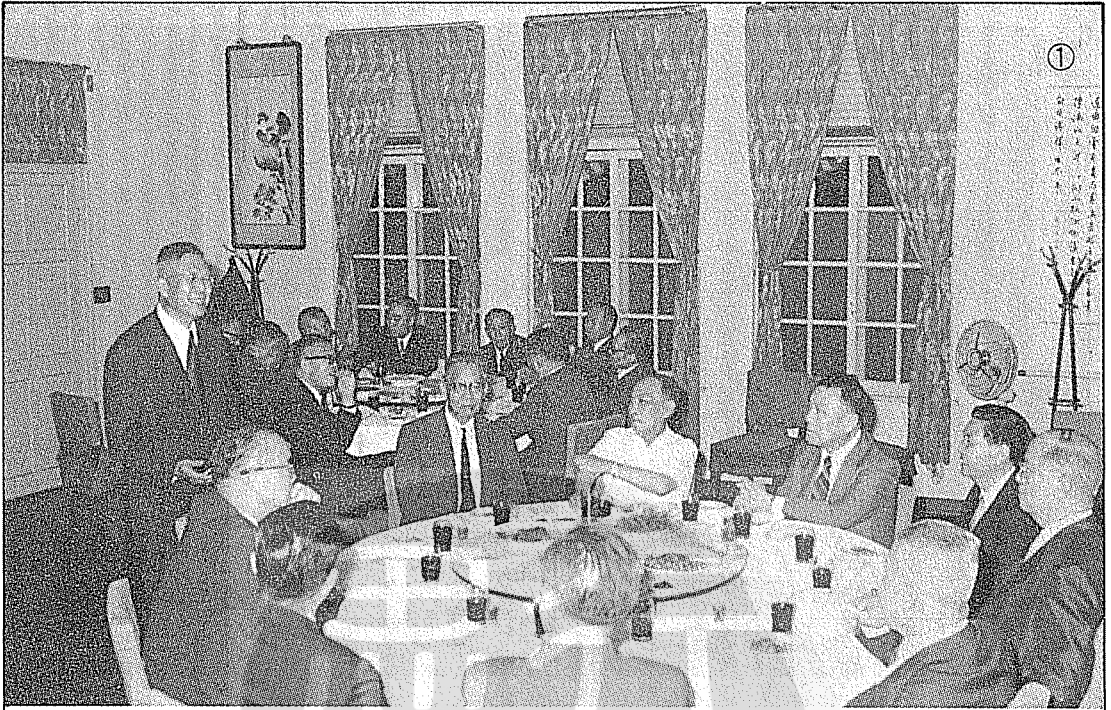




①前排左起：張其昀、戴運軌、李新民、陳慶瑜。後排左起：王成聖、張迺藩、袁其炯、余紀忠、朱滙森、梅璘高、何福元合影。

②張其昀博士與楚崧秋、王成聖、戴運軌合影。(文見35頁)





①張其昀博士在中大校友餐會致詞時的神情。

②左起：吳俊升、鍾皎光、張其昀、戴運軌。（文見35頁）

